

## 马相伯思想发展特点刍议

李庆华

(菏泽师专社科系,山东菏泽 274015)

**摘要:**马相伯的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民族爱国主义者,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民族性是贯穿马相伯各种思想的一根红线;积极追求民主共和,倡导地方自治是他晚年思想的鲜明特色;马相伯一生能紧随时代潮流,与时俱进是他思想的最大特点;他还是一位天主教信徒,对社会历史的观察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马相伯的思想从不同方面促进和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关键词:**民族性;民主性;时代性;宗教性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62(2003)04-0059-03

马相伯(1840~1939),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人。他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是一个有多方面影响的人物,活动范围涉及到政治、宗教、教育、外交、实业等诸多领域。在对马相伯各方面思想进行系统考察的基础之上,本文着重分析了其思想中具有民族性、民主性、时代性、宗教性四个方面的特点。这是对马氏思想特点进行的首次探讨,有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 一、民族性——爱国救亡

马相伯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民族性是贯穿马相伯各方面思想的一根红线。马相伯在当时虽然以西学素养深厚名闻于世,但并非是那时比较突出的“二毛子”形象,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民族爱国主义者。他一生在教育、宗教、政治和外交领域为中国人争取权益,他的西学知识全用在民族的工业化、民主化和近代化中。他认为一个爱国者学到本领后就应该奉献给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如他18岁时应聘法国领事署秘书,宣言“我学法语,非为法国用,是为中国用”。<sup>[1](P1045)</sup>36岁时,又向耶稣会长说:“我从来不是法国耶稣会士,如要我做法国会士,我宁愿不是耶稣会士。”<sup>[2]</sup>体现在创办教育事业上,马相伯主张在中国办学就是要为中国培养人才。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年,西方教会在中国兴办了许多教育机构,从蒙学堂、幼稚园到高等学堂、大书院等。这类学校大多宗教气氛比较浓厚,办学目的就是要培养亲西方的世俗人才,营造有利于基督教传播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如1890年由书院改为大学的美国基督教徒创办的圣约翰大学,其教育内容就是典型的殖民地化教学。训练中国青年为基督服务是圣约翰大学的办学宗旨。在圣约翰大学的课程和

课外活动中,宗教灌输和宗教活动始终是摆在首位的。他们让学生接受宗教意识的熏陶和奴化思想的渗透,通过潜移默化,养成上帝至上的意识,而淡薄了国家和民族观念。马相伯办学的目的和这些教会学校截然不同。如他在由他创办的复旦公学的章程中明确规定了办学宗旨在于“俾吾国有志之士,得以研究泰西高尚诸学术……内之以修立国民之资格,外之以裁成有用之人才。”<sup>[3](P50)</sup>他对辅仁大学提出的要求,也是希望能为中国造就人才,“数十年后,会士为中国会士,公教为中国公教,大学为中国大学”,而不是“仿殖民,吸取人才,造成附属品也”。<sup>[4](P458)</sup>都是以中国培养人才,服务于中国为目的。体现在政治和外交思想上,马相伯对日本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野心有着高度的警觉,对他们牺牲中国而又欲欺骗世人的伎俩洞若观火,对帝国主义列强和各种腐败无能、贪婪媚外的政权极为痛恨。马相伯的外交思想不务虚名,处处以中华民族的实际利益为重。尤其在晚年,在外敌入侵面前,马相伯更是把他强烈的民族和国家意识体现于具体的行动中,和当时的天主教士雷鸣远、陆微祥、于斌等一样,都是著名的宗教爱国人士,被社会各界尊称为“爱国老人”。马相伯以一生的实际行动向世人证实:尽管他拥有西方的教育和信仰背景,但内心深处积淀的是一种由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哺育出来的深沉的民族心理。

### 二、民主性——追求民主共和

追求民主共和是马相伯后期思想的一个鲜明特色。在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后,马相伯的思想也由君主立宪转化为民主共和,并积极投身于建立民国的活动中,同原来主张君主立宪的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思

收稿日期:2003-03-17

作者简介:李庆华(1969-),男,山东郓城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想拉开了距离。这主要是因为马相伯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中民主平等的思想影响更深,他认为皇帝和众人一样,大家生来都是平等的。而康有为此时一反昔日抨击君主专制的进步立场,处处为清政府评功摆好,认为清朝实行的仁政早已使中国人享受到充分的自由、平等之权了。围绕是否立孔教为国教和是否把“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写进宪法这两个问题,马相伯同康有为和康的弟子陈焕章之间的矛盾冲突势同水火。这不仅仅是教派之争,实质上是民主制和君主制在政治文化上的反映。

康有为关于建立孔教的设想最初就是受到西方基督教渗透中国的刺激。他认为要救国保种需要从拯救和保存民族文化入手,孔教作为中国的国粹,灭孔教“是与灭种同其惨祸”。从某种意义上说,康有为设立孔教的思想是民族主义的,具有救国保种的意向。但康有为又并非是一个纯粹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在20世纪初民国刚刚成立之时,他不满于新生的民主共和制,所谓“民主共和,无一良宪法也。”<sup>[5](P839)</sup>在康有为主办的《不忍》杂志上,连篇累牍地攻击共和制,鼓吹非孔教、非复辟不能救中国。马相伯从宗教平等、信教自由、孔子精神不合乎现代生活等角度立论批驳康、陈的孔教学说,并从经济上揭露嘲讽陈焕章立孔教为国教的真实意图。不仅如此,马相伯还对从袁世凯到段祺瑞再到蒋介石尊崇孔教和礼教的目的和意图进行了揭示,点明了历代统治者所以崇奉孔子的用意,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参加者对孔教的批判相得益彰。

马相伯的可贵之处在于对民主共和制度的坚定信仰。从他投身于民主革命之日起直至他生命的结束,马相伯始终坚持民主共和的信仰,坚持以民国的公民自居,这一信仰从来没有动摇过。尤其是在民国初年,当时中国社会弥漫着一种危机感,夭折的革命并没有带来人们期望的结果,但革命对旧制度的冲击所诱发的种种社会问题却并未随着革命的夭折而终结,相反随着政治的逆转而空前恶化。不论是在民主共和制下新出现的不良现象,还是在清王朝专制制度下沿袭已久的恶政、痼疾,都因其表现在民国初年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而统统被记在了新生的共和制下。对民主共和制度的诋毁和指责,不仅仅来自清室遗老,立宪派和一些革命派也因不能容忍民初的种种弊端而附和了民初要求恢复旧秩序的呼声。康有为得出结论说:“号为共和,而实共争共乱;号为自由,而实自死自亡;号为爱国而实卖国灭国。”<sup>[5](P703)</sup>认为“若夫未行立宪而超入共和,则是小儿慕飞船之悠扬天空,而遽欲学焉,未有不颠坠而死者矣。”<sup>[5](P882)</sup>革命派章太炎对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的努力也提出批评,他认为一国的“政治法律,皆以习惯而成”,“若横取他国已行之法,强施此土,斯非大愚不灵者弗为。”<sup>[6](P532-533)</sup>主张赋予袁世凯实行专制独裁的权力以解决当时的社会危机,公然说:“宜请大总统暂以便宜行事,毋容拘牵约法,以待危机。”<sup>[7](P378)</sup>相比之下,马相伯对民主制的坚定信仰和为共和辩诬的态度更值得人们称道。在《辛亥政见》中,马相伯响亮提出:“所不以华盛顿为法者,天下共击之。”<sup>[3](P111)</sup>斥指那些自称由于得江山而有权坐江山的皇帝及其依赖的武人为“天下之大盗”。主张要消灭那些“先天的皇帝”和“后天的君主”,以保障国民主权。并分析民国初期

万方数据

的混乱状况造成的原因在于民国名实不符,在于“袁皇帝”的可恶。袁世凯利用中世纪旧有的迷信,非但侵犯人民固有的政治权,而且侵犯政治权赖以产生的经济管理权,侵犯人民世代所有的物权即财产所有权。结果在清帝国专制之下,人民还可以控告不法官吏乃至对不法官吏复仇,在袁世凯时代反而由一切持枪的武夫决定,所谓“国民为主”,名和实都不存在。并分析无论国体是君主制还是民主制,在政体上只有两种:“任心”即从礼俗出发而凭良心为政的是专制政体,“任法”即制订各种法律引导主权行使的是法制政体,法律的精髓是保障自由权,有人民的自由才有国家的自由。中国政体向来只有专制而没有法制,但民国以来的统治者不要任何礼或法,只凭个人喜怒或伺察他人喜怒为政,连专制政体也不如。因此人民就应该秉诸自治自立自由的天性,决不能听任这种政府的支配,以成为当之无愧的民国之民。

马相伯认为,民主共和国家立国的根本在于人民先有自治能力,因而主张地方自治。地方自治运动从清末新政开始成为一种社会风潮,许多著名的学者、政治家、实业家都持此主张,如蔡元培、张謇、章太炎等。马相伯是倡此说历时最久、对民治思想论述最为充分的代表之一。实施民治、实施地方自治是马相伯一贯的政治主张,从1916年的《书〈分合表〉后》和1918年的《国民照心镜》一直到30年代系统的民治思想的提出,马相伯对地方自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历史、哲学、政治、国防、财税等多方面进行了论证。他认为宪法是保证民治的,民治的最要点是地方自治。马相伯以美国联邦制为蓝图,以中国古代郡县制为地方政区,以保甲制为基层组织,为我们勾勒出一幅从区到县、府、邦、联的邦联制政治体制方案,体现出马相伯浓厚的资产阶级民主精神,有利于中国公民意识和民族意识的产生,有利于国家观念的形成。马相伯还把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中的天赋人权、国家概念、国民意识、民主共和等等一系列重要问题都向国民进行了宣传介绍,反对封建专制、提倡民主自由,代表了历史发展的趋向,对于唤醒沉睡的中国人起到了启蒙作用。

### 三、时代性——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是马相伯思想总的特点。从清末洋务运动开始,马相伯始终能够紧随时代的潮流不断进步,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马相伯自37岁进入世俗社会以来,先后经历了洋务运动的躬行者→维新运动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宪政运动的干将→辛亥革命的积极参与者→民主共和制度的积极维护者→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爱国老人这样几个重大发展阶段。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变化急速,各种思潮风云激荡,昨天还是站在时代前列,代表历史发展前进方向的历史人物,今天就有可能因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而落伍。如马相伯一样能自始至终基本上站在时代的前列,紧随时代大潮而不落伍的人物,在近代史上是罕见的。马相伯还能够根据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而有所作为,如在甲午战争后,社会兴起教育救国的思潮,马相伯抱此夙愿,积极创办了震旦大学和复旦学院,积极筹划设立中国国家科学院——函夏考文苑,成为杰出的资产阶级教育家,创办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和高等研究机构的先驱者。在20世纪初叶的科学主义思潮中,他积极提倡科学,倡导科学救国,

调和科学和宗教,是中国教会自主和本土化运动的先驱者。并且马相伯的影响也是随着年齿的增长而逐渐扩大,最早进入社会是作为李鸿章的幕僚,担任朝鲜国王顾问也是以其弟马建忠的名义;袁世凯统治时期作为总统府高等顾问,更多的是荣誉头衔;直到“九一八”事变后,马相伯积极主张抗日,赢得了全国性的声誉,被公认为爱国领袖。柳亚子先生曾咏称他为“一老南天身是史”,<sup>[8](P1)</sup>马相伯的百年生涯就是伴随时代大潮而不断进步的历史。

#### 四、宗教性——神学与科学并举

马相伯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信徒,对造物主怀着虔诚的信仰。从这个视角观察社会,他对一切社会历史现象的认识极容易打上宗教的色彩。他的政治思想多带有宗教的气味,他认为依靠“神我愉快”的天性,人类可以组织一超越世俗利益的国家,而保持“神我之愉快”又是政党形成的动机,因而被人概括为“神我宪政说”和“神我政党说”。他还主张以《圣经》作为法律的基础,以基督教来整治世道人心等。他的历史观显然是基督教神意史观和英雄史观。认为“天地间,惟造物主能生死人,祸福人。故惟造物主,能立教条以号令人,立教规以管理人。”<sup>[9](P494)</sup>并认为中国之所以产生专制政府和适宜专制政府统治的国民,在于缺少像他一样的“先知先觉者”的指导,芸芸众生只有接受他们的“启蒙”,跟随他们的步履,才能得到光明。马相伯用他的基督教神意史观来观察社会生活,过分看重了宗教的社会作用,而对宗教的负面作用则认识不到。

马相伯既是一个宗教神学家,又是一位科学家。马相伯的宗教思想继承了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徐光启等的传统,重视科学,在基督教“创世说”和“秩序论”的基础上把科学思想和神学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认为科学探究会让人懂得宇宙是有秩序的,是可以被探知或证明的,最终人们就会认同和信仰安排宇宙井然有序地运行的终极主宰——上帝。因此,科学研究的过程,也就是人类逐步接近和皈依上帝的过程。科学的知识成为人们认知上帝存在的一种

手段,对上帝的信仰成为科学探究的动力。在这样的意义上,马相伯把研究科学与传播信仰巧妙地结合起来。并为他从事科学研究、提倡科学提供了理论依据。

总起来看,马相伯一生民族感情和民族气节特别强烈,他各方面的思想都能体现出他强烈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和侵略中国的图谋,积极主张御侮救亡。马相伯对清晚封建专制和以后的军阀独裁统治极为反感,对民主共和的倡导不遗余力,从壮年到暮年,一直为中国走出中世纪而矢志不移,对久处专制统治下的国民进行了思想启蒙。为使中国走向近代化,马相伯不仅把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中的近代国家概念、国民意识向国民进行了宣传,而且兴办了近代化的高等学府,以培养近代化的国民,也同样重视近代科学和实业的发展,马相伯的思想从不同方面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代化。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在中法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 参考文献:

- [1]马相伯.在国家忧患中生长着.马相伯集:卷五[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 [2][美]马爱德(译).罗马耶稣会档案.(ARSI)“Sinensis Franciae, 1863-1878,” Sin. 4-5.
- [3]马相伯.复旦公学章程.马相伯集:卷一[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 [4]马相伯.美国本笃会士创设北京公教大学宣言书稿.马相伯集“卷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 [5]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6]章太炎.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C].北京:中华书局,1977.
- [7]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下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
- [8]宗有恒,夏林根.马相伯与复旦大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
- [9]马相伯.“圣难译译”叙.马相伯集:卷三[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 Trial Comment On the Feature of Ma - Xiangbo's Thoughts

LI Qing-hua

(Social Science Department, HeZe Teachers College, Shandong China-274015)

**Abstract:** Ma Xiangbo had rich thoughts. he was a famous national patriot in modern times in China. He had strong national and state consciousness and nationality is a clue ties up all his other thoughts. The outstanding feature in his late period thoughts is seeking democracy and republicanism and initiating local self - government. Ma Xiangbo adapted himself to era trends in his whole life, his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 is his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He was also a catholic, his observation toward society and history had strong religious features. In a whole , Ma Xiangbo's thoughts from every aspect promoted and pushed forward the pace of moderniz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nationality; democratization; era quality; religious quality

# 马相伯思想发展特点刍议

作者: [李庆华](#)  
 作者单位: [菏泽师专, 社科系, 山东, 菏泽, 274015](#)  
 刊名: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SHANGQIU TEACHERS COLLEGE](#)  
 年, 卷(期): 2003, 19(4)  
 被引用次数: 0次

## 参考文献(9条)

1. 马相伯 [在国家忧患中生长着](#) 1996
2. 马爱 [罗马耶稣会档案](#)
3. 马相伯 [复旦公学章程](#) 1996
4. 马相伯 [美国本笃会士创设北京公教大学宣言书稿](#) 1996
5. 康有为 [康有为政论集](#) 1981
6. 章太炎 [章太炎政论选集](#) 1977
7. 李剑农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1998
8. 宗有恒, [夏林根](#) [马相伯与复旦大学](#) 1996
9. 马相伯 [“圣难经译”叙](#) 1996

## 相似文献(10条)

1. 期刊论文 [倪爱山, 徐国利](#) [简论清末民初新史学 -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24(4)

清末至新文化运动前的新史学以西方历史进化论为理论基础, 以科学实证为基本方法, 它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变革和深入发展的奠基石。本文对这一时期新史学形成的内因和外因, 新史学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三大表现形式, 新史学的三个特征, 即科学性、民主性和民族性, 及其重大意义进行了简要的阐述。

2. 学位论文 [张胜利](#) [现代性追求与民族性建构——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2007

本文以现代性与民族性为线索全面梳理了20世纪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坎坷历程与卓越成就。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扬弃, 前者肯定了后者的具有普世性的现代价值, 并将人的解放的现代性主题安置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 使现代性价值的真正实现成为可能。民族国家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 是人为建构的结果, 因此民族性是一种现代性建构, 发明和创造出一种新的传统。早期的左翼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批判传统文化, 吸收西方文明的积极因素, 创造具有民族性新文化的道路。古代文学研究是新文化创造的主要组成部分。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了前现代性观念和资产阶级现代性观念, 初步建设了具有民族性的现代性文化, 确立了文学研究的价值尺度和理论方法。他们以民主与平民主义为其文学研究的政治立场; 以个性自由与人性解放为文学研究的价值尺度; 以科学精神与唯物史观为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他们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 发掘古代文学资源, 重新阐释古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关注广大平民的情感意愿, 提出平民文学的主张, 强调人格的独立和文学的自由, 批判了传统的“文以载道”观; 突出现实主义精神, 重视写实主义文学, 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古代文学, 分析文学所表现的社会心理。

20世纪20年代后期, 中国社会政治形式风云突变, 知识分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密切关联,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 促进了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文学的融合。随着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深化, 历史唯物主义在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更趋成熟。鲁迅等人成功地将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结合起来, 为历史唯物主义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社会问题”是知识分子关注的中心, 他们探讨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 社会意识大大增强, 社会分析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发展。文学研究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结合得越来越紧密, 文学研究的革命化特点越来越突出。鲁迅开创了历史唯物主义文学研究的新范式, 并且主张文学研究应积极接入社会; 郭沫若运用“革命文学”理论, 研究了历史上革命时代的革命文学, 强调人民本位, 开辟了《诗经》研究的新境界; 郑振铎从经济视角研究元代文学, 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文学的成功范例; 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得到初步尝试, 其主要目的是认清历史真相; 这一时期唯物史观的文学研究扎实前进, 终于成为一种成熟的研究模式。

毛泽东的文学思想, 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典范。毛泽东的文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思想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具体成果。毛泽东提出文艺民族化问题, 主张继承具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文化遗产, 强调文化领导权的作用。毛泽东的文学思想, 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 and 古代文学研究的格局。建国之后, 出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实施文化领导权, 将这种典范通过政治体制、文化机制以及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作用, 转变为文学研究的规范, 指导着古代文学的研究。这一时期知识分子选择了社会主义现代性, 爱国主义是他们转变的情感基础。在新社会他们找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岗位, 经过思想改造, 确立了人民立场。这一时期社会历史批评一枝独秀, 注重社会历史背景的分析, 强调阶级性和倾向性。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爱国主义和人民性是文学研究的关键词。新时期以来, 在“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导下, 古代文学研究从政治的附庸状态下解放出来, 确立了古代文学学科的独立性, 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综合运用各种方法的主导多元的研究格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从人性论角度研究文学, 运用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精神阐释古代文学的现代价值。第二, 运用心理分析批判和心态研究方法, 叩问人类精神世界, 分析作家的文化性格。第三, 文化意识增强, 强调从文化的视角考察文化对文学本体特征、美感形式的影响; 也注重文学与文化的互动, 文化在文学中的表现和文学对文化的作用。主要考察了政治文化视角、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方法的运用, 以及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道教等文化现象与文学的关系。第四, 文学研究回归文学本体, 探索文学演进内在规律, 文学的内部研究得到加强。综合运用语言学、符号学方法分析文学文本, 借鉴叙事学理论研究中国叙事学。传统文体研究在世纪末成为学术亮点。

最后, 总结了经济全球化时代, 古代文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3. 期刊论文 [莫志斌, 崔应忠. MO Zhi-bin, CUI Ying-zhong](#) [毛泽东建国思想的主要特色与当代启示 - 怀化学院学报](#) 2010, 29(7)

毛泽东的建国思想, 从五四时期至新中国建立之初, 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他在不断发展的实际斗争中扬弃以往的建国思想, 从而建构起合乎中国实际的国家模式; 其建国思想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 独特的民族性, 坚定的科学性, 崇高的人民性, 强烈的民主性等主要特色。毛泽东建国思想是一个巨大

的理论宝库,在当代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

#### 4. 期刊论文 李俊生 论肖邦玛祖卡舞曲中的民族性特征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 5(3)

波兰伟大的钢琴家、音乐家肖邦的创作,始终离不开一个永恒的主题,那就是他的祖国。而他的音乐创作土壤自然就是节奏的民族性、旋律、调式、和声的民族性。他所要表达的民主性音乐内容,在他创作并演奏的大量玛祖卡舞曲中得以深刻的而又全身心的倾诉。

#### 5. 学位论文 蒲慧 渐进、妥协、保守——英国贵族院宪政改革述评 2009

在世界民族中,英国显得非常独特,她最早开创了世界最先进的现代议会文明,而在其他国家争相效仿的时候,她却固执地保留着世界上最古老的议会团体——贵族院。该议院长期保留世袭贵族的议席,同时不但具有立法权,还有司法审判权。贵族院是英国贵族们占据政治权力的据点,自产生之日起就犹如一棵常青树根植于英国政治文化之中,在英国的政治发展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王权时期,他们充当了富有政治凝聚力和创造性的社会群体。在与王权的斗争与妥协中,引导着英国议会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但贵族院因其产生的世袭性也给自身的发展带来了局限性。随着时代的变迁,历史的车轮已经由步入到民主政治时代,社会公众的民主意识得到较大发展,贵族院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改革的命运。

本文以贵族院的改革为研究立场,在深入分析大量一手材料的基础上,通过纵向比较阐述了英国贵族院的历史沿革及法律地位的变化,并全方位探讨贵族院改革的背景、内容、内容及发展的趋势,并着重总结贵族院改革及内容的特点,力求从理论上对贵族院的改革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对比较宪政学的发展做出有益的贡献。

本文以贵族院的改革为线索,全文共五部分。

第一部分,从历史视角简略阐述贵族院历史沿革及各个时期内法律地位的变迁,从总体上对贵族院做一全景式的概括。

第二部分,具体探讨贵族院的职能。本部分将贵族院的职能归纳为一般职能与独特职能。其中,一般职能包括修改议案、协助平民院职能;独特职能主要包括司法审判职能、行政参与职能以及权力制衡职能。

第三部分,主要分析贵族院改革背景。本部分从内在和外在两方面分析贵族院改革的背景,其中内在原因主要表现为贵族阶层经济实力的衰落、政治特权的丧失以及贵族院本身所固有的顽疾即议员产生的非民主性、司法权与立法权的熔合;外在原因主要表现为平民院权力的增强、工党的崛起与执政及内阁权力的扩张。正是内外因素导致贵族院改革势在必行

第四部分,主要讨论现阶段贵族院改革的阶段性成果,并明确贵族院改革的发展趋势。贵族院改革的初步成果主要表现在废除世袭贵族以实现结构改革,剥离司法职能以实现职能改革。贵族院的改革趋势问题主要探讨了改革第二阶段对贵族院议会地位的界定、贵族院的产生方式以及贵族院的职能与权力等等相关问题。

第五部分,主要对贵族院改革进行深入的宪政思考。本部分指出贵族院改革的正当性:一方面来自于英国的宪政传统即对自由平等权的追求,另一方面来自于两院制制的平稳运行机制;本部分还概括抽象出贵族院改革特点即渐进性、妥协性及保守性以及贵族院改革启示即改革应体现民族性、民主性和政治性。

#### 6. 期刊论文 黄日干 论社会主义本性与党的先进性建设 -学术论坛2006,“(4)

社会主义具有发展性、公正性、兼容性、民主性、民族性等本质属性。其中以发展性、公正性为基本目标,以兼容性、民主性、民族性为基本手段。它们构成了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本性的基本内容体系。发展性要求善谋发展,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公正性要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维护社会公平,实现人间正义;兼容性要求善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具有开放意识、应变能力、广阔胸怀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民主性要求依法治国,维护好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民族性从本民族的实际出发,坚持民族独立与平等,促进民族共同发展。

#### 7. 学位论文 瞿岳荣 关于十六大以来党的和谐文化观的若干思考 2008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是中华民族团结一心、不断进步、走向繁荣的精神支柱和智慧源泉。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进程中,我们要着力建设和谐文化,推进中华文化的创新,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努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一个无心的民族,就会走向神衰体亡,心强才能力壮;一个无魂的民族,就会成为行尸走肉,魂灵才有睿智;一个无根的民族,就会枝枯叶黄,根深才能叶茂;一个无体的民族,就会任人摆布,体健才能强盛。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需求,它以其悠久、博大、精深的内涵,具有持久的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亲和力,唤起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荣誉感。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和谐文化观。党的和谐文化观具有主导性与多元性,现代性要求善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理想性与科学性,民主性与法治性等几组矛盾的辩证统一特征。它不仅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文化的精华,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文化理论,同时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和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有着深远的实践指导意义。

#### 8. 期刊论文 许颖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新特点新论 -理论界2008,“(3)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富有特色的部分。由于所处的特殊的国内和国际环境,这一时期的统一战线呈现了不同于其他各个时期的特点。这些特点体现在统一战线的广泛性与复杂性相结合;统一战线的民族性与民主性相结合;统一战线的公开性与隐蔽性相结合;统一战线的民族性与国际性相结合。分析这些特点,对于全面理解和掌握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 9. 期刊论文 王万里, WANG Wan-Li 论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创新特色 -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7, 24(10)

孙中山不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也是中国20世纪最杰出的法律思想家。五权宪法是其法学思想精髓。其主要内容是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离,主权在民,人民享有政权,政府只享有治权。五权宪法思想具有民主性、科学性、民族性、人民性、超越性等创新特色。

#### 10. 学位论文 赵斐斐 政党政治与政治现代性 2009

现代性作为西方启蒙运动的“人权宣言”、“独立宣言”,向全球拓展的人类新时代的精神,是人类经历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和工业化革命三大运动对以往的认识和思想进行了一次颠覆性活动所取得的最显著的成果。现代性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种历史状态与历史秩序,在经济上表现为实行市场经济,追求契约与平等竞争;在政治上坚持实行民主政治;在文化上倡导自由、平等、博爱;同时,现代性还指涉为人类生存的一种境遇,它尊重人的正当权益,注重人的个性与能力的发挥,确立理性的权威,崇尚人的自主,维护人的权利,倡导人的主体性与解放,追求人的权利与自由;现代性又是一种反思的精神,它包含着对现代化进程中的进步与代价的一种审视、反思和批判。启蒙运动以来,伴随着现代性的演进过程,人类逐渐把现代性看作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制度模式,表明生活在现代化中的人们不仅渴望追求自由与平等而且渴望获得秩序与价值,为此人类逐渐确立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生活方式与制度模式即现代民主制度。政党政治作为人类特殊的政治共同体,不仅是现代民主制度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现代性得以拓展和延伸的一个重要领域,因此把政党政治纳入现代性的视域中,是对二十世纪以来对现代性理解上的丰富和完善。<br>

在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中,随着人类共同体的现代性意识与诉求愈加突显,共同体内部必将因利益而产生分化、差异,因利益谋求妥协与整合,进而诉求政治参与,最终导致政党政治的生成。正是从现代性演进的角度切入本篇博士论文的主题,论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导论、正文和结语。在导论中,主要探讨论文研究的旨趣、意义及价值,同时指出对政党现代性研究要有自觉意识、开放意识和反思意识,不仅有一个全球视野,还要有一个共进的共时性眼光,更要具有一个深邃的历史性眼光,即对政党现代性研究应当采取“结构性”、“历时性”和“共时性”三重向度。正文:第一章,对现代性的内涵进行简要的梳理,并指出政治现代性作为现代性构成的主要部分,是现代性演进的一条重要路径,以民主、自由、平等和权利等价值理念作为内在的元素,以民主、自由、平等和权利等构成的现代民主制度作为其外在的支撑。其内在在逻辑演进由神权政治共同体走向契约型政治共同体;由代议制民主共同体走向政党政治共同体,可以说正是政治共同体的这种现代性意识催生了具有现代意义性的政党产生。第二章,分析了政党的生成及其现代性运作,指出政党的内涵流变并对政党的基本构成作简要的分类。在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对政党的运作功能进行综合分析,并提出:(1)政党的代表性功能:包括利益的表达、整合,政策的制订等;(2)政党的程序性或制度性功能,包括政党领导的功能、议会和政府的组成等,这为考察政党的功能提供了一个具有较强解释力的分析框架;第三章对政党现代性的内涵及其展现作了系统分析,指出政党的合法性、政党的民主性、政党的法治性、政党的政治参与性是政党现代性构成的主要组成部分;第四章则系统地分析了政党现代性演变的多重维度,指出以科层制为结构支撑,以寡头式或少数人集权为显著标志,具有相对严明的纪律规范约束,主张自上而下的单向性等级结构的总体性政党、科层制政党等经典现代性政党与坚持反逻辑、反中心主义,主张差异性和地方主义和追求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提倡抗议民主、激进民主,谋求权力的边缘化、多元化、平面化的后现代性

政党和另类政党在纲领、目标等诸多方面存在重大差异；而作为社会民主党、绿党等反思性政党在治国理念上，既反对经典现代性政党追求的统一和集中，也反对后现代性政党主张的碎片和虚无，更注重从事实中构建规范，主张协商性政治强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相结合的民主。可以说政党现代性嬗变的多重维度表明，随着社会的转型，政党的政治功能和自身的合法性也要与时俱进地加以调整。从经典现代性、反思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发展变化使政党现代性遭遇了重重危机与困惑。在全球化和存在高度风险的今天，政党如何处置好自身的现代性问题，避免陷入“党派地质学”的震动，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面对这些危机与困惑，政党一方面改造传统政治功能，坚持由侧重于行政式的外在控制的统治到侧重于法治式的内在参与的治理转变；另一方面提出新的应变策略和价值理念应对变化，放弃“单一中心式”的主体，而强调“多元多中心”的主体，以妥协包容应对多元社会。在治理过程中，无论是左翼政党的左翼替代战略还是绿党的政治生态主张，无疑都是政党为适应时代要求而提出的一种现代性纠错方案，这正是第五章所探讨的主要问题。在前面几个章节的基础上，第六章、第七章转入了对中国政党现代性的生成与建构的思考，并全面反思了中国政党在现代性试错的基础上，是如何从模仿的现代性中自觉的走出，通过实践把现代性与本土性、民族性进行科学、有效地结合起来最终实现政党的中国化开启，进而指出，中国政党新现代性的建构既不同于追求是同一性、普遍性，强调一致和秩序，强调权力统治、中心和等级，偏离价值理性的经典现代性；不同于强调非中心、差异性和不确定性，以随意播撒所获得的零乱性和不确定性来对抗中心和本原的后现代性，也不同于吉登斯的“反思现代性”、哈贝马斯的“重建现代性”以及利奥塔的“重写现代性”。中国政党的新现代性是建立在中国社会新现代性发展基础上的以构建和谐社会为中心的新现代性基础上的政党现代性。结语，则指出全球化正改写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为现代性的多向度发展与创新，注入着新鲜的血液。一方面，现代性的培育和发展、现代化的实现从来是全球化中的现代化。不仅表现在物质层面的“文化”容易“趋同”。还表现在，制度和行为层面上的“文化”较难“趋同”。而地方性、民族性、差异性、多元性等后者正是我们探讨现代政治文明时应该关注的重要内容。在全球化和中国化的双重夹击中的中国政党如何自觉地调整以适应全球政治社会结构发生的深刻变迁以及保持自身的先进性，这对中国政党提出了挑战与机遇。世界政党生态的深刻变化，促使政党的现代性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正改变和调整着自身的质态与结构，既保留传统政党的一些基质和功能又吸收后现代政党的新质，既孕育着与全球化相互涵容、相互顺适的因子又留存着与之相互反驳、相互矫正的成分，从而使政党现代性与全球化之间充满着张力。这种现实要求中国政党作出“适应性”的变革，尽快获得现代性自觉意识。这场适应性变革，涵盖中国政党内部生活和外部活动的各个方面，贯穿中国政党自身管理和领导、执政活动的整个过程，涉及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一场深层次、全方位的政党文明提升和再造过程。<br>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qsfxyxb200304023.aspx](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qsfxyxb200304023.aspx)

授权使用：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授权号：93233a44-d148-4c07-8235-9e4d008fab73

下载时间：2010年12月15日